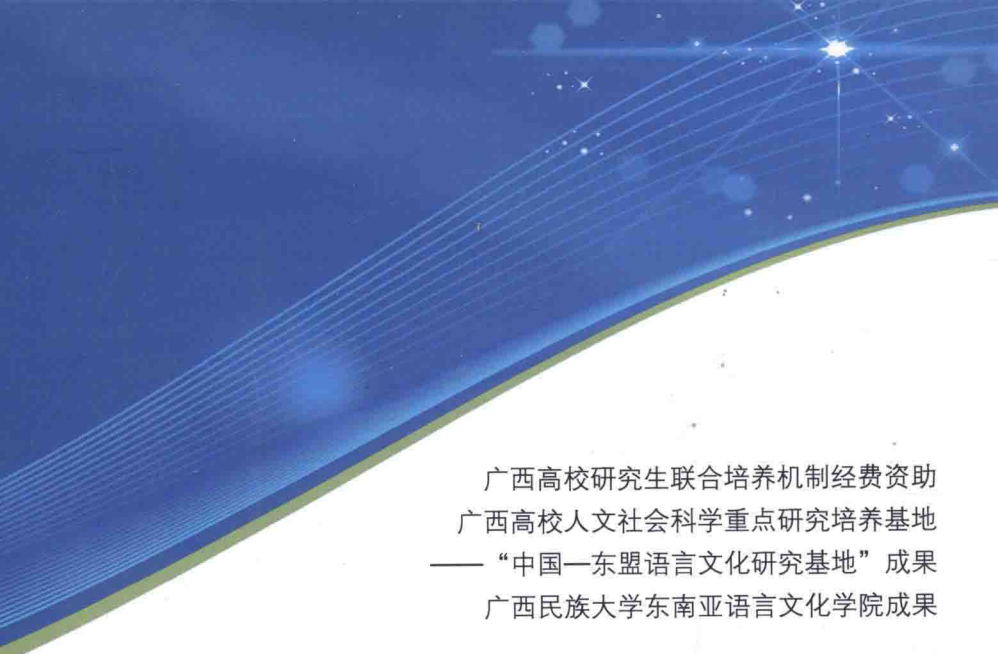




广西高校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经费资助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养基地
——“中国—东盟语言文化研究基地”成果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成果

华南与东南亚论稿

范宏贵 著

民族出版社

广西高校研
广西高校人文社
——“中国—东盟语言文化研究基地”成果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成果

华南与东南亚论稿

范宏贵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南与东南亚论稿/范宏贵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105 - 13461 - 8

I. ①华… II. ①范… III. ①中南地区—地方史—
研究②东南亚—历史—研究 IV. ①K296②K3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0645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张华

封面设计: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 <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360千字

印张:13.375

定价:45.00元

ISBN 978 - 7 - 105 - 13461 - 8/K · 2384(汉 1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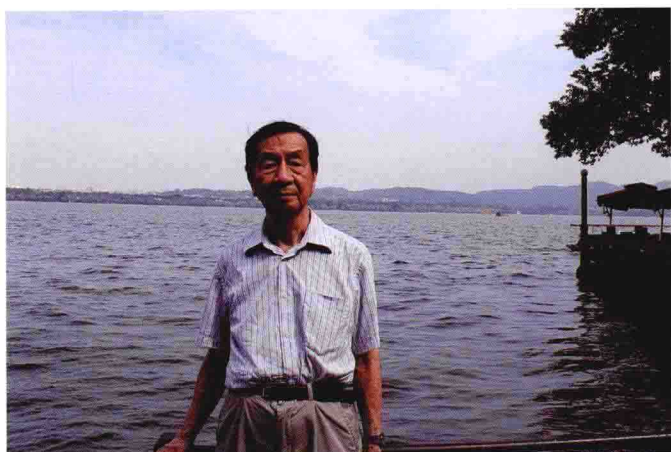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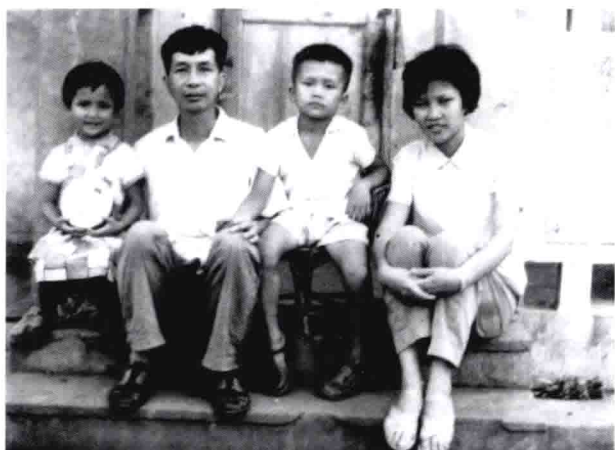
2010 年在家中小憩



2013 年在杭州西湖湖畔



1962 年与夫人梁慈美



1969 年一家四口在南宁



2011 年与夫人梁慈美在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2006 年在香港大学讲学



2007 年在越南人文社科大学讲学



2008 年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学



2010 年与泰国学者查瓦里－平坡交谈



2011 年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讲座



2012 年在广西百色学院讲学



2013 年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学



2013 年 11 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祖国阵线主席阮善仁到范宏贵家中访问

目 录

八十感怀 / 1

感 恩 篇

我与费孝通教授的一段师生情 / 27

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先生 / 33

沿着徐松石先生的足迹前行 / 46

民族·文化篇

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53

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族文化仍有个性 / 63

古人对民族的识别 / 72

壮族“不落夫家”的婚俗 / 85

瘴疠保护了西瓯、骆越人及其后裔 / 91

浅谈歇后语 / 101

依智高 / 106

岑 猛 / 113

黄守忠 / 120

忆当年广西史学界的盛会 / 127

边贸兴起，边民受益有多少 / 129

回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前身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二三事 / 133

我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学术交往 / 139

东南亚篇

试谈东南亚文化 / 145

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问题 / 153

越南农业革新中的一朵鲜花——庄园经济 / 159

关于越南民族起源问题的论争 / 166

越南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 172

壮泰各族对“天”的信仰与崇拜 / 180

从壮泰族关系读《泰国古代史地丛考》 / 187

泰国铜鼓见闻 / 193

越南泰族的由来 / 195

壮族、泰族、佬族先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画面 / 209

缅甸掸族与中国德宏傣族的渊源关系 / 227

中、越、老、泰国家壮泰族群的饮食文化 / 240

印度支那联邦的由来 / 252

越南语文琐谈 / 257

20 世纪前半期在云南的越南人 / 271

辛亥革命与越南 / 289

从小钱币看大社会 / 303

广西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创建初始的回望 / 308

越南讲学记 / 312

赴泰讲学记 / 316

我们是兄弟 / 321

华侨华人篇

泰国乌隆府华人的中国心 / 327

缅甸华侨华人社会随笔 / 337

序 言 篇

- 壮泰族群研究的接力棒 / 349
- 以小喻大 / 355
- 跟踪研究的范例 / 362
- 探寻蛊毒秘密 / 365
- 全面评价民间宗教 / 368
- 研究跨境民族，了解邻国 / 370
- 值得比较的女性文学 / 373
- 学术要探讨 / 376
- 后浪推前浪 / 378
- 探寻民族区域自治的佳作 / 381
- 学习越南语的桥梁 / 384
- 引领学生学习越南语 / 387
- 拓宽知识 当好翻译 / 390

访 谈 录

-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范宏贵：老骥伏枥 志在东盟 / 395
- 广西民族大学范宏贵夫妇帮扶中泰文化交流 / 399
- 一位越南研究生的广西“因缘”相思湖畔攻读民族学 / 402
- 朝曦青丝勤为耕，夕阳红霞映桑花 / 406
- 濒危的壮歌，拿什么拯救你 / 411
- 附录：越南灰姑娘的故事 / 416
- 后 记 / 422

八十感怀

人到老年都爱回忆往事，不仅我是这样，恐怕这是老年人的共性。我不仅回味自己的过去，也看看别人是怎么活过来的。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大致可以归纳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一生一帆风顺；第二种是一生在苦海中挣扎；第三种是先甜后苦的人生；第四种是先苦后甜的一生；第五种是苦苦甜甜，甜甜苦苦相掺杂的人生旅程。我属第四种类型，应该说是幸运的。

一、锻炼与熏陶

我的青少年时代最富理想，深受小说、电影的影响，一时想当仗义疏财的豪侠；一时想当冒险勇敢的侦察员，当福尔摩斯，当亚森罗频；一时想当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时想当作家……随着年岁的增长，较为理智，我掂量自己不是当上述角色的料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有为少数民族创制拉丁化拼音文字的打算，在中央民族学院培养一批有这方面专业技术的人才。1952年考大学，我被录取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以后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我很高兴，今后将会成为仓颉。那时一切都向苏联学习，1956年，国家要建立民族学专业，请来苏联专家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主任切博克萨罗夫教授来校传经送宝，讲苏维埃民族学，于是，我本科毕业后，就保送深造，转入历

史系民族学研究生班。我认为，少数民族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很值得研究、探讨。苏联专家给我们上了两年课。除我们研究生听课外，还有很多青年老师也来听课。我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党培养的民族学专业干部。苏联专家讲了三门课，一是世界民族志，我们研究生背后戏称是吃喝拉撒睡，另外是经济类型、文化圈，后两门课还有点意思。

我在大一、大二时，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担任院学生会的秘书长、青年团的干部，花了很多时间。我对别人说，那个时候，我像一只赖抱鸡，懵懵懂懂，不晓事理。现在回想起来，有得有失，得的是有了社会工作的经验，在众人面前不胆怯，敢讲话，会讲话。失的是影响了学业。到了大三时，我才醒悟到即将到社会上工作，要有本事。在这一点上，我比别人觉悟得晚，这时已是 20 岁的人了，才醒悟过来，虽然晚了，但亡羊补牢。

中央民族学院的教职工由两大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党政干部，是由老革命干部组成。另一部分是从其他名校调来的教师，1952 年学习苏联，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从事社会学、语言学的教师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科，如失业问题、妓女问题、民族问题，等等。当时认为新中国没有社会问题，甚至把社会学当成资产阶级学科而取缔，但承认有民族问题，于是把从事社会学的教师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民族研究，其中有国内顶尖的、在国际上也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如费孝通、潘光旦、夏康农、翁独健、林耀华、杨成志、闻在宥，等等。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从日本回来后也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北京大学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也在中央民族学院兼职。此外，还聘请北京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教授，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出来）著名学者罗常培、吕叔湘、夏鼐、傅懋勳等给我们上课。真是明星荟萃，搞民族学这里是全国的一块宝地。有时我们也到北京大学听名家的学术报

告。因此，学术气氛很浓，我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受到熏陶。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还有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有的还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有的还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构成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1956年，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即将结束，中央决定派遣调查组下去抢救难得的资料。调查业务由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教授牵头，抽调各路专家到北京，制定规划，编写调查提纲。1956年7—8月，在苏联专家到来之前，从北京高校和研究单位抽调了一批学者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内学习，请来了顶尖的专家来授课。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也常来跟我们讨论民族学的定义。这是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和学习，学到很多知识，扩大了视野，初步知道如何去观察各种现象，看其本质。如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种复杂的问题，受益很大。

二、苦闷与读书

我读中学时，调皮贪玩，只有历史和地理两门课全班第一，其他科的成绩并不好，尤其是数理化。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课（现在叫语文课）老师每周都评点学生写的作文，把写得好和不好的作文念给大家听，我的作文是当成写得不好的念出来，虽然老师没有点我的名字，但我心里明白，羞得我脸都红了，后来我加强了写作。我的处女作是1954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豆腐块大的小文章。我从越南报刊上看到的信息写了越南影讯，在我国的《大众电影》杂志上登载过七八篇。提高我中文和越文水平的是，1956年和1957年在《民族问题译丛》杂志上发表的越南民族问题的长文，尤其是翻译《胜利的越南》一书（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和《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一书（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

为使译文能发表、出版，达到“信、达、雅”的水平，我一个字一个字抠，一句一句斟酌，还请语文水平高的同学帮忙提意见，修改润色。我花了很多心血，受益也很大，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为今后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翻译和写作是不同的两码事，自己写可随心所欲，遇到困难可以绕过去。而翻译就不能，原作怎么写，你就得怎么翻译，不能跳过，这就要翻译者有高水平的汉语、丰富的词汇，使译文优美易懂。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写作能力得到飞跃提高。后来在“大跃进”时，我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二三十个人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写调查报告，写壮族历史，我写得最快最好，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得到同事们的肯定，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正当我有良好起点的时候，晴天霹雳，厄运袭来。1957年，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帮助党整风，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我并没有写过、贴过一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莫名其妙地给我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三番五次地批斗我，从批斗追问的问题和党总支书记苏冰找我个别谈话，启发教育我，才悟出问题的根蒂。原来，闻在宥教授有一部18世纪的越南文字典，这是稀有之物，非常珍贵。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专家越南人金洪交（阮金坦）得知后，想到闻在宥家看看这部字典，为此，我先后到闻家四次。这时正是“大鸣大放贴大字报”的高潮时期。有一次，有位教授到闻家，刚好碰到我与闻教授在交谈。这位先生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又不调查了解，就向组织汇报说，闻与范某在密谈。“反右”开始后，费孝通被打成全国的大右派。闻先生和费先生都是民盟的成员，又是邻居，于是怀疑费孝通一闻在宥一范宏贵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费、闻通过我在青年学生中煽风点火，向党进攻。因此，多次批斗会逼我交代这个问题，我只能如实说到闻家的真实情况，不能无中生有，苦恼至极。在批斗闻先生的大会上，要我去揭发闻先生，我不能昧着良心

说瞎话。于是我被当成右派分子，开除青年团团籍（改革开放后平反，恢复团籍，发给退团证明书）。在等待处理的一年时间里，同学们都担心被连累，躲避、远离我，我受到孤立，在路上相遇，人家视若无人。这是精神上的打击。这种滋味别人是无法体会的。1958年底，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苏克勤在宣布处理右派分子的大会上说，范某某宽大处理，不算右派，但不是没有错误。意思是批斗我没有错。这让我陷入极度苦闷中，我一直跟着党走，何来的反党？虽然躲过这一劫难，但属极右分子，此后低人不是一等，而是两三等。从此，我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

我一直纳闷不解，我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解放前，是我的少年儿童时代，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1949年昆明解放前，一些进步书刊已在学生中半公开流传。1947—1948年，也就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从兄姐手上转来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丁玲著的《红旗呼啦啦飘》、赵树理著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还有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幼稚的心灵。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拥护。1950年，抗美援朝时，我报名参军。16岁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内心深处只有跟党走，感谢党，哪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这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词，像磐石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

1958年，我参加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当时有一位很“革命”的人，处处找我的茬，平平淡淡的话，也鸡蛋里挑骨头，批判我。很多人不敢跟我接近、来往。唯有胡起望、任崇岳、华祖根、苏达民少数人跟我说话。至今我虽然已耄耋之年，还记得清清楚楚，还很感激他们。我们虽然青春不再，但友谊长存。

那时是“大跃进”年代，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恩格斯

语)的干劲工作,人家在没日没夜地大炼钢铁,我们也得不分昼夜地苦干。此时的“不分昼夜”并不是形容词,是确确实实的没日没夜,每个人都像是上了发条一样,每天都连轴转。

1958—1961年,我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了3年,到过很多壮村瑶寨,得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从南宁出发都可以乘车,由县城到公社、大队就得背着行囊,靠两条腿跋山涉水。到十万大山调查,险些把性命葬送给突然暴发的山洪里。正当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全民大炼钢铁高潮的时候,我正在广西的武鸣、上思、龙州、柳江、鹿寨、灌阳、全州搞调查,目睹千军万马的农民大军浩浩荡荡地山野安营扎寨大炼钢铁,尤其是夜晚,整个原野火光冲天,十分壮观。在柳江县成团公社调查时,正是秋收时节,男女老少都被赶去大炼钢铁了,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眼睁睁看着谷子掉到田里,没有劳动力去收割。一位生产队干部见我是自治区下来的干部,向我反映,这么搞明年吃什么?我能讲什么呢,我也有同感,我只能说向上级汇报以示安慰。不久就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接着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谈自己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看法,宣布“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而且强令每人每天必须向组织写交一百张小字报,用绳子挂在办公室供众人观看。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训,我是牢牢记住,吃一堑长一智,对“三面红旗”不能,也不敢抹黑,在小字报里尽找生活琐事交代。第一天怎么样都挤出一百张,以后天天一百张可就难了,大概小字报写了半个月才停止。反右时的左派,有恃无恐,对“三面红旗”略微说了点儿心里话,就遭到批判。前车之鉴,“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敢、不想参与,是个逍遥派。反右以后的历次运动,我都很谨慎,算是安然无恙过来了。

我的政治处境不好，也不想惹是生非，埋头读书，从中得到乐趣。1961年，我从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出）民族研究所调到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历史系、政治系、外语系、民族研究所工作。刚来民院时，我抄了不少壮族和越南的史料，足有一尺厚，手指都起了老茧，给我留下纪念，为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做好了准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时，人家在武斗，打派仗，我写了约10万字的《中越关系百年史》书稿，今后有时间再补充整理，可以出版。翻译了一本越南反特小说《一网打尽》，还收集了2000多条歇后语。这期间读书是我唯一的乐趣。

我的知识是从8个方面得到的，第一是从老师处得到的，除了在课堂上老师授课得到，课外也得到不少，尤其是成年以后；第二是从教科书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传统的知识；第三是读书得到的，最初是广泛涉猎，青少年时爱读义侠、侦探、革命斗争类的书，成人后读专业书；第四是听报告，有政治时事报告、学术报告，我更喜欢后者；第五是座谈会，发言比较自由，是报刊书籍中得不到的知识，很有用；第六是研讨会，尤其是争论激烈的问题，听听人家是如何分析问题的；第七是与别人交谈，哪怕是晚辈，我也注意听，与他们交换意见，尤其是在晚年，青年人思想活跃，跟得上潮流，有不少新东西我是在与他们交谈中得来的；第八是成年后搞田野调查，涉及面很广，得到很多生动活泼的知识。

我也有遗憾，没有学好英语、俄语。我小学四年级10岁就学英语，初中一年级在教会学校读书，是一位牧师来教，她不会汉语，全用英语，我听不懂，在下面玩。新中国成立后，读研究生时学了两年俄语，毕业后没有用，全还给老师了。改革开放后，掀起了学英语热，我一算如果要重新拾起英语，花的时间太多，用学英语的时间我可以写出很多文字，掂量一番，就没有学了。现在我只用越南语可以用，中越关系曾经恶化10多年，我以为越南语没有用武之地了，不料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山重水复疑无路，